

白照译
文对全
战国策上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BA25/01

95
K231.04
5
2:1

文白对照全译战国策

(上册)

王扶汉、孟明 主编

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C

195357

〔京〕新登字 184 号

责任编辑：柯 彦

封面设计：陈景异

责任校对：叶 宇

文白对照全译战国策

王扶汉 孟明 主编

*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1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32 印张 700 千字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1—3000 册

ISBN 7-81001-297-5/K·50

定价：21.00 元(上、下册)

01

《文白对照全译战国策》编委会

主编

王扶汉 孟 明

编委

王立新 王红文 柴海泉 杨贤军
王雪峰 赵宏伟 刘开胜 文逸波
周生军 宋伯约 吴冬梅 董建中
者美杰 董玉梅

原文主要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出版的
三卷本《战国策》

前 言

大凡激烈动荡的时代，在社会意识、经济结构、政治体制发生较大变革的时代，每每诱使，甚至迫使人们为了个人以至邦国的图存、发展而逞才斗智、运策筹谋。在此种情况下，更多的超人的智慧、奇诡的策谋就自然成了时代的需要、时代的产物、时代变革的催化剂。战国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。《战国策》，从这个角度说，就是战国时代二四五年间，以纵横家为主的，依国别编次的策谋汇编。

刘向与《战国策》

《战国策》是西汉末刘向校定、编次成书的，书名也是刘向定的。他在《校定战国策书录》中说：

中书本号，或曰《国策》，或曰《国事》，或曰《短长》，或曰《事语》，或曰《长书》，或曰《脩书》。臣向以为战国时，游士辅所用之国，为之策谋，宜为《战国策》。其事继春秋以后，讫楚、汉之起，二百四十五年之间之事。……

这三句话明白道出，刘向在把此书校定、编次

成书时为此书定名为《战国策》的理由，并且指出在刘向以前，此书即已有《国策》之名。“策”，实为此书内容最准确的高度概括。同时，刘向也确切、清楚地剖析了这些策谋产生的社会基础。他在《校定战国策书录》中说：自“田氏取齐，六卿分晋”即“道德大废，下下失序”，“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，诈谲之国兴立为强。”各国诸侯“遂相吞灭，并大兼小，暴师经岁，流血满野。”而“晚世益甚。万乘之国七，千乘之国五”更是“贪饕无耻，竞进无厌”，兵革不休，诈伪并起。”在此种境况下，“虽有道德，不得施谋。……故孟子、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，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”。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，于各家学说中遂发展出从横短长之说，即苏秦的合从，张仪的连横。而当时的社会趋势则是“从则楚王，横则秦帝”。以苏秦、张仪为首的从横家们更是“所在国重，所去国轻。”

提起战国时期，常使人自然想到百家争鸣。二百多年间，不受拘束，各抒所见的百家争鸣确实形成了学术、文化领域、意识形态领域极其辉煌繁盛的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，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当时各家在争鸣中实际也在各献策谋。只不过在“兵革不休，诈伪并起”的社会具体情况下，有些长线策谋虽或影响后世千百年，甚至直到现在，但不能解决那时的眼前问题。“故孟子、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。”不仅如此，道家、墨家、名家、阴阳

家等，虽然论说争辩激烈、热闹，其实都不免受到各国诸侯的冷落。而短线策谋，如法家之说，於国内，可以加强、巩固诸侯君长的统治，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可富国强兵。兵家之说及其所行，对外，可进图兼并，退谋防守。故这两家比较见重於时。而以奇策异智，假口舌之利，诡譎欺诈，捭阖机变的从横家言则较兵、法二家尤为便捷，更易取得实效，更易满足诸侯之所急需。苏秦约六国以合从，六国乃可以相对暂安。张仪相秦庭而连衡，更兼秦申法治以慑于内，振兵威以胁于外，强暴诈谲，遂一天下。从横家之所倡者，皆为超短线策谋，并大行于时，各家之说都不足与之抗衡。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所记即以苏秦、张仪为首的从横家的这些超短线策谋为主。刘向把这些策谋产生的社会基础剖析得十分清楚。对以这些策谋倾侧君王的人们，称作“游说权谋之徒”。更指出这些策谋是因势为资，据时为策的，是以“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”的。同时，刘向也明言这些策谋：

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，运亡为存。亦可喜，皆可观。

战国时期为什么儒、道诸家受到冷落，兵、法二家受到重视，从横家大行于时呢？其根本缘故就在于其说是否“度时君之所能行”。试想：在“道德大坏”，“兵革不休，诈伪并起”的社会，“互相吞灭，并大兼小”的紧迫形势下，那些“贪饕无耻，竟

进无厌”的时君，谁有暇去听关于道德、仁义、隆礼乐、尊王道的说教，崇自然，尚虚无的谈玄以及离坚白、合同异的辩难呢？当然更谈不到是否能行的问题了。法家有利于君王压服人民，加强统治，兵家攻城野战，进可侵夺，退可自保。这两家自是时君之所需。因而其说也是时君之所能行。从横家不大用刀兵，不大耗国帑，以奇谋异智，假口舌之利收攻城野战之功，此则不仅为时君之所能行、易行，更是时君之所乐行。从横家的奇智也正在于洞察社会，细致地审时度势，充分估计“时君之所能行”。观《战国策》所载苏秦、张仪全部游说之辞，这一点确实是十分清楚的。故刘向此语底确抓住了战国时期各家遭遇不同的关键。而后世对刘向的非议，甚至对从横家言欲“放而绝之”者却多想於此打开缺口。但不管怎么说，《战国策》是刘向从凌乱的断简残编中校定，编次成书的。没有刘向就没有流传至今已达两千年之久的《战国策》。而且，刘向还为《战国策》定了书名，写了非常精辟，足供广大读者阅读《战国策》参考的《书录》。刘向之功，垂不朽矣。

攻讦与贡献

一部书在长久的流传中免不了受到持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士的攻讦，也免不了在流传中有所散佚，经

人搜求、考校、重编而复原或经人校注、训解而广流传。但一部书既受到一个人的攻讦，又在其书有所散乱佚缺之际受到此攻讦者苦心搜罗，访佚补缺，重校，再编而复原，或于其流传中经攻讦者精心校注益广流传的事例则不多见。《战国策》就一再遇到了这种情况。其一是宋曾巩对《战国策》的重校复原，其二是元吴师道对《战国策》的校注。二人对《战国策》所载“战国游士之说”都是欲“放而绝之”的，二人对《战国策》流传的贡献却又都是最为卓越的。

刘向校定、编次《战国策》之后，东汉末，曾注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的高诱作《战国策注》。这是《战国策》的第一部注释。此注虽已残缺，但仍具有较大的权威性。经魏、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至宋，历年既久，又迭经战乱，《战国策》书与高诱注颇有散佚。曾巩

访之士大夫家，始尽得其书，正其误谬，而疑其不可考者，然后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复完。

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三十三篇复完的《战国策》，不能不感激曾巩。在《战国策》的流传史上，曾巩之功不可没矣。但攻讦此书所载战国游士之说最猛烈、最不遗余力的却正是曾巩。在他重校完此书之后所写的《重校战国策序》中说：

向叙此书，言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。及其后，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，所以大

乱。其说既美矣。卒以谓此书，战·国·之·谋·士，度·时·君·之·所·能·行，不得不然，则可谓惑·于·流·俗·而·不·笃·于·自·信·者·也。

曾巩正是从刘向所说的“度时君之所能行”来打缺口的。他认为刘向说这句话是“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”。那么，曾巩认为刘向“不笃于自信”什么呢？这就是孔、孟所“独明”的“先王之道”。曾巩认为：“盖法者，所以适变也，不必尽同；道者，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。此理之不易者也。”而

战国之游士则不然。不知道之可信，而乐于说之易合。其设心注意，偷为一切之计而已。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患。其相率而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。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。卒至苏秦、商鞅、孙臆、吴起、李斯之徒以亡其身，而诸侯及秦用之，亦灭其国。其为世之大祸明矣，而俗犹莫之悟也。

显然，曾巩把刘向所说的“游说权谋之徒”的策谋一概认为分明是“世之大祸。”刘向之“惑于流俗”就是为这样明明白白的“世之大祸”所惑，因而使其对先王之道不能笃于自信。乃说出“度时君之所能行”之类的话来。曾巩自我认为似乎已于此劈开一个缺口，于是痛斥战国游士之说诸般罪恶，最后归结为“世之大祸”而提出唯“宜放而绝之”。

元吴师道作《战国策校注》，就《鲍氏战国策注》作出补正，广稽群书，校注精审。被《四库全

书总目提要》誉为古来注《战国策》之最善者。其功亦踵曾巩而不泯矣。但吴氏亦继曾巩攻讦《战国策》不遗余力。其《战国策校注序》谓：“战国名义荡然”。春秋时期，霸道尚“假义以为名，仗正以为功”，战国时期，各国诸侯连掩饰霸道的两个幌子——“义”和“正”都不要了。干脆赤裸裸地“攻斗并吞，相诈相倾”。“间有持论立言不戾乎正，殆千百而一二尔。若鲁仲连盖绝出者，然其排难解纷，慷慨激烈，每因事而发，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，超乎事变之外也，况其下者乎？”并进而指出，在《战国策》中，於当时唯一的本仁祖义之大儒——孟子竟全未涉及。更列举十余事以证《战国策》所载之为“邪说”，以证曾巩所云之为正论，以证曾巩对刘向“惑於流俗”的指斥是正确的、必要的。

曾、吴二氏重校，校注《战国策》，对此书的流传作出的贡献确实是极其卓越的。但他们何以既深恶其书所载战国游之说又苦心搜求，精心校注其书呢？曾巩说：

君子之禁邪说也，固将明其说于天下。使当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从，然后以禁则齐；使后世之人，皆知其说之不可为，然后以戒则明。岂必灭其籍哉？放而绝之，莫善于是。

吴氏认为，果如曾巩此说，君子读此书则“守益以坚，智益以明”。小人读此书“则悔悟惩创之心生”“而”将有不为者矣”。

这就是曾、吴二氏重校、校注《战国策》的重要目的。他们欲“明其说于天下”从而“放而绝之”的目的究竟达到了没有？不仅没达到，反而使《战国策》的流传更顺畅，更广远。至于君子读此书后如何，小人读此书后怎样，谁知道呢？是否与吴师道的主观愿望一致，谁知道呢？

浩瀚书海，二千余年来，佚绝典籍不可胜计。其中固然有因遭当权者嫉恶而被籍没、焚毁者，亦有因水、火、战乱、诸般灾害而佚绝者。亦有不少典籍虽遭当权者嫉恶而不一定便佚绝者。秦始皇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，而《书》与百家语尚有所佚而未绝，《诗》则更无所佚缺，况其权、其暴又不及嬴政者耶？至若曾、吴二氏于所嫉恶之《战国策》，不欲，也不能尽灭其籍，乃一方面“明其说于天下”，欲使人皆知其说之害正。一方面辛勤考校、或精心注释其书，刻印流传。如此“放”而欲“绝”之，怎么绝得了呢？倘若明其说之“害正”于天下时，再持论偏颇，缺乏说服力，恐怕便只剩下考校，注释，以广流传了。或者更有人指出其偏颇，说明其如何缺乏说服力，而且也明之于天下，岂不使《战国策》更广流传了？其实，曾、吴二氏对《战国策》，主观认定其书所载几尽“邪说”，明其“邪说”之“害正”于天下，志在“绝”之。持论偏颇，已不可避免。夸大其“邪”，势所必然。如此，其论“邪说”“害正”之言岂能不多所牵强，岂能有多少说服力。

曾巩说，“苏秦、商鞅、孙臆、吴起、李斯之徒”为游士之说“以亡其身”，这就夸大过分了。为什么把孙臆也列入曾氏所谓的“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”，“论诈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恶”的游士之中呢？孙臆是战国时期兵家的杰出人物，在《战国策》中并没说他曾游说诸侯去“言战之善而蔽其患”。至于诈，则兵不厌诈本是千古兵家克敌制胜的要诀之一。兵而不用诈，岂不明摆着比指挥泓之战，大败，伤股而亡的宋襄公还愚蠢吗？孙臆在实战中确曾以诈取胜，但《战国策》何尝言孙臆曾游说诸侯去“论诈之便而讳其败”呢？更谈不到什么“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……”了。然而，更重要的孙臆之被断足、黥面，是因庞涓嫉其才而欲埋没其人。此前，并未见《战国策》及他书有孙臆游说诸侯的记载。更无孙臆死于游说诸侯，偷为一切之计，蔽战之患，讳诈之败的记载。

再者，《战国策》所载实以从横家游说之辞及反复倾侧之行为主。乃至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都把此书列入子部，从横家类。当然，如此归类或有不当。但亦足见其书中从横家之言辞、行事所占比重如何了。曾巩列举为游士之说“以亡其身”诸人多举兵家、法家，甚至把孙臆也强塞进去，於从横家却只举苏秦一人。实在未为公允，也太乏说服力。固然，苏秦首倡连横，合从之说，且於合从之说行，又计使张仪入秦连横，以迄秦灭六

国，一天下，其历史作用也较大较深，足以为从横家之典型。但倾侧君王，诡譎欺诈，若曾巩指斥诸瑞，恶劣尤甚于苏秦者，尚有张仪在。故史家言从横，则苏、张并举。张仪则未以为游士之说而亡其身。其它从横家之犖犖大者，如苏秦的两个弟弟——苏代、苏厉“皆宗苏氏之从约”而“代、厉皆以寿死，名显诸侯”。此则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之所明言，其他如公孙衍、陈轸等诸多游说之士都没遭致苏秦的下场。因此，以一苏秦之下场概言诸游士之以游说从横短长以亡其身，当然说服力是十分不足的。而且，关于苏秦，司马迁还特别说：

然世言苏秦多异，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。夫苏秦起闾閻，连六国从亲，此其智有过人者。吾故列其行事，次其时序，毋令独蒙恶声焉。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去战国未远，而关于苏秦的记载、传闻已多有附会不实者。其写《苏秦列传》亦欲有所澄清，毋令苏秦“独蒙恶声”。於《张仪列传》中更明言：

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，然世恶苏秦者，以其先死，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，成其横道。

是苏秦所蒙恶声就有张仪所“振暴”的。

苏秦，果如曾巩所云那么一无是处吗？

《战国策·秦策》称：

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之大，万民之众，王侯之威，谋臣之权，皆欲决苏

秦之策。不费斗粮，未烦一兵，未战一士，未绝一弦，未折一矢，诸侯相亲，贤于兄弟。夫贤人在而天下服，一人用而天下从。故曰：式于政，不式于勇；式于廊庙之内，不式于四境之外。……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，桑户棬枢之士耳，伏轼搏街，横历天下，廷说诸侯之王，杜左右之口，天下莫之能抗。

此语于苏秦之贤与其功固未免有所夸大，但谁能断定其为无中生有，全无所据或颠倒黑白呢？刘向说：

然当此之时，秦国最雄，诸侯方弱，苏秦结之，时六国为一，以候背秦。秦人恐惧，不敢窥兵于关中，天下不交兵者，二十有九年。

司马迁则谓苏秦合从：

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。

吴师道并斥刘向与司马迁之说为“虽甚失实，不顾也。”但吴氏并未举证以明刘向、司马迁所云之如何失实。刘向所谓“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”未免过分。但通观《战国策》，参以于鬯《战国策年表》，至少秦惠王五年（公元前333年）至秦惠王改元七年（公元前318年）十五年间无秦兵出函谷关与六国争战的记载，与《史记》所云相合。怎么能说“失实”呢？刘向所云虽未免夸大，但有此十五年之合从抗秦，至少制止了不能不记载的大规模战争的发生。刘向的话也不可以谓为“甚失实”。吴师

道如此指斥刘向之说，倒可以谓为“指斥失实”，而其对《史记》的指斥，则不能不算“甚失实”了。据此，苏秦合从确曾使一些小弱国家“转危为安，运亡为存”战乱有所平弭，民人得以休息，这是不能否定的。且苏秦本图连横，说秦不行，遂事合从。合从已成，乃计使张仪入秦连横，於函谷关内外暂成相持之势。十余年间天下相对稍安而张仪连横之势亦已发展成熟，从而加速了秦灭六国的进程。故，倘无苏秦之合从，并计使张仪入秦连横，则从势难於持久，十五年之休息又安得而致？倘无张仪之连横，秦灭六国，一天下进程又焉能如此快速？而秦不灭六国，成一统，始皇死后，又怎能“一夫作难”不三年而秦之“七庙隳”，不五年而汉王朝建立，真正开始了中国长久统一的局面？自秦孝公至始皇二十六年，秦灭六国用了百余年，而刘项灭秦仅三年而已。倘秦不用连横以一天下，讵能如此？就历史作用而言，张仪又怎能完全否定呢？不过，为了张人之恶，从而放绝其说来论人论事。偏颇又怎能避免呢？至于“诸侯及秦”是否都因为用游士之说而“亦灭其国”呢？曰：否。一国之存亡，原因岂止一端？於战国及秦，皆归之于用游士之说，其乌乎可？显然，曾、吴二氏之说是极不全面的。即以用游士之说言，至少也是只言其亡，不言其兴。贾谊《过秦论》说：

秦孝公据殽、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

守以窥周室。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，商君佐之。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具；外连横而斗诸侯，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此语论秦之兴，则有地缘优势，有君主大略，有游士之内外佐助。无疑，利用地缘优势，实现君主大略，用游士之说是极其重要的。只罪其致亡，讳其佐兴，怎能有说服力呢？曾、吴二氏宁不知有《过秦论》乎？宁不知始皇与二世之暴虐百姓，荼毒人民，迫使氓隶戍卒揭竿而起“卒亡秦族”乎？宁不知李斯、赵高之奴颜媚主，助君为虐乎？宁不知始皇亦曾逐客乎？讳言世所共知之史实，强为偏颇之论，其何以服人？至于六国兴亡，亦非徒以是否用游士之说之故。以楚国而言，若非怀王昏乱，宠郑袖，信奸谗，上官大夫、司马子椒等“贪婪而竞进”，令尹子兰等“众芳之芜秽”，张仪又何能戏弄怀王于掌股之间？顷襄，考烈以降君益昏聩，国益病弱。楚斩国祚，又何可以独责之于游士也？以赵国而言，倘不废廉颇，用赵括而大败于长平；不杀李牧，黜司马尚而用赵葱、颜聚，其灭亡又岂能如此之快速也？韩、魏、齐、燕又何尝不若是邪？且自春秋以后，暴寡兼弱的趋势已甚明鲜，战国时期更加速了强国吞灭他国实现统一的进程。此固历史大势所趋，战乱频仍，游士活跃，百家争鸣，逞才斗智，争为诸侯运策筹谋实际上都是在这种总趋势